

## 第三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声柏

(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730000 兰州,甘肃省,中国)

田 飞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730000 兰州,甘肃省,中国)

作者: 陈声柏,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主任,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 chensb@lzu.edu.cn。田飞,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 rerc@lzu.edu.cn

依旧是繁花盛开的时节,2011年5月10-12日,第三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兰州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办,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兰州大学学报》编辑部协办。在两天半的会期中,来自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等全国各地的40多个哲学、宗教学研究学术单位的80余位专家学者及嘉宾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从提交的170余篇论文中遴选出约60篇论文编成论文集提交会议发言讨论。

兰州大学副校长陈发虎教授,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长梁燕城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教授,甘肃省宗教事务局局长丁军年先生出席开幕礼并致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传统宗教与社会、宗教对话理论的探究、儒耶对话、佛耶对话、伊耶对话、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宗教对话在中国的实践等七个议题,以科学的态度探研了“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这一时代话题。

### 一、中国传统宗教与社会

对中国传统宗教与社会的关注,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重点。这部分的论文主要从以下两个路径进行论述:

第一,宗教本身作为一个信仰体系,或意义世界,对不确定的生活世界予以框定,但这种框定是如何发生的呢?在现在这个日渐世俗化或祛圣化的社会中,这种框定

是否会被逐渐消解?在《先秦儒道有限性思想研究》一文中,兰州大学彭战果认为,先秦儒家从天命那里发现了人生存的有限性,道家则从认知缺陷入手,阐明了认知的有限性,而有限性的存在,给予了儒道两家超越自身的前提。但是在这种超越过程中,两家又都回到有限的存在来否认人有最终实现无限和圆满的可能性。在《儒教伦理与明清麻风病“污名”问题札记》一文中,杭州师范大学周东华认为,麻风病的“污名”是被儒家伦理规条中的“秽、恶、淫”三端所构建出来的,所以秉承儒教伦理的官绅们对麻风病患采取了“徙、养、禁”为核心举措的隔离疗法。在《董仲舒的神学美学》一文中,南京大学包兆会认为被儒家伦理所规定的董仲舒美学有两大特质,即神性与人文可以通约,神性最终被人文解释所吞没,以及伦理的诉求占据其美学的中心地位。在《〈国语〉中的神与民》一文中,中国人民大学张永路运用政治哲学视角解读《国语》中神、民合称这一“神民叙述”模式,从而探讨了春秋时期独特的宗教信仰。

以上宗教的意义世界所表现出对生活世界的种种框定,在现今日趋世俗的社会中有什么变化呢?在《知识之神圣性及其祛圣化历史与效应》一文中,宁夏大学任军认为伴随知识祛圣化,理性、宇宙、历史与时间、语言、宗教也同时被祛圣化。在《民间信仰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之探略》一文中,华南师范大学贺璋璐认为信仰和宗教作为意义的根源在现代社会仍有巨大的生存空间。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地区的民间秘密教门》一文中,阜阳师范学院梁家贵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西北地区的民间秘密教门呈现教义带有时代特征和在政治立场等方面的整体分化的变化,对西北抗战、及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造成一定影响。在《明清会道门的内丹修炼》一文中,北京大学匡钊揭示出内丹修炼在会道门那里是作为一种内部组织手段而存在的。

第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传统宗教对话的成功范例,都会对解决当今多元文化冲突的困境提供借鉴意义。陕西师范大学韩星的《全真道三教合一的理论特征》、武汉大学姚彬彬的《近现代新儒家与佛教华严学》、南京大学郭美星的《试论“玄佛合流”的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意义》三篇论文,就是按照上面这种思路和角度进行了内容不同(一为道儒释、一为儒佛、一为玄佛)的探讨。

## 二、宗教对话

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是本次会议的主题,而关于不同宗教间、宗教与科学、宗教与社会的对话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是会议绝大多数论文涉及的议题。细分起来,可以从以下六方面进行概述。

### （一）宗教对话何以可能：理论的探究

不同宗教间的对话之所以可能，一个简单的解释逻辑似乎就是：不同宗教在“各自”的独特处之外，还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惟有如此，“各自”才能够相互交流和对话。

#### （1）各自之外的“共通”

在《宗教对话——从理解、合作到自身发展》一文中，中南神学院的肖安平提出“对话十诫”的对话原则和“以灵性实在为中心”的对话点。在《社会发展语境中的宗教对话：从巴哈伊经验说起》一文中，香港大学宗树人和兰州交通大学万兆元从巴哈伊教义和经验的出发，试图在“科学、宗教与发展”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宏大的宗教对话的合理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各宗教团体可以愉快地谋求对话与交流。在《宗教对话与宗教批评》一文中，华中师范大学戴立勇认为宗教对话体现的是一种宗教性语境，宗教批评则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政治性语境。在《麦格夫等人对新无神论的批评及其意义》一文中，赫尔辛基大学黄保罗对新无神论兴起的现实原因及其理论渊源进行了探讨，进而指出新无神论与传统无神论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区别。《对科学的现代神学回应——斯温伯恩与设计论证的当代论争》一文中，香港中文大学的贺志勇和华中科技大学的欧阳肃通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对话是站在双方各自独立性基础上的，并强调了二者在预设、方法和概念方面的相似性。

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个解释的逻辑，即只有异质的东西才有对话的必要。那么，这样的宗教间、宗教与科学、宗教与社会的对话的价值何在呢？

#### （2）共通之外的“各自”

在《众神相争的诅咒？——宗教对话的核心边缘模式》一文中，北京大学郭慧玲区分了信仰世界的核心层次和边缘层次，认为当代全球化形势下的宗教转型、信仰者的多元认同交叉和各种宗教对话理论的建构，为宗教对话障碍的消解提供了契机。在《从“一宗与万宗”到“众言与圣言”》一文中，香港浸会大学梁媛媛认为巴特对于宗教的批判不应被解读为基督宗教对于其他宗教的批判，而是启示神学对自然神学、对被神学化的神学的批判。

在《希腊神话与希伯来族长传说：家庭观念比较研究》一文中，河南大学梁工通过对俄狄浦斯弑父娶母、亚伯拉罕杀子两个希腊和希伯来核心故事的比较，考察了两希文化在家庭观，进而在世界观、伦理观和民族精神方面的不同特征。这表明，即便在西方文明的内部也存在着具有明显差异的两个源头——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那这种差异还有怎样的表现，以及如何融通呢？在《希伯来先知的伦理关于言说方式》文中，西北师范大学姜宗强认为只有在面对完美上帝时，在神本语言之中，人类才

能关照到自身的自私、有罪和局限,这也是希伯来先知传统对以“人言”为特征的儒家传统最具冲击力的地方。而在《浅谈奥利金融合希腊主义和希伯来传统的尝试》文中,山西大学李勇却认为,希腊主义和希伯来传统被奥利金通过寓意解经的方法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融合。

此外,复旦大学陆扬在《否定神学:德里达与伪狄奥尼修》一文里认为,否定神学的例子表明上帝从来就没有在语言中充分展示过自身,所以上帝在今天的语言中展示自身,并不会比过去更艰难。南京大学张志鹏在《宗教对话与灵性市场竞争规则的建构》一文中认为,宗教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消除宗教竞争和分割灵性市场,而是确立更为合理的竞争规则和提供更好的灵性服务。

## (二) 儒耶对话

基督教与儒家(或儒教)的对话,既有大的视角分析,也有小的个案研究。

在《从“儒学与宗教的讨论”看儒家与基督教教的对话》一文中,兰州大学张言亮对儒家宗教性论争的历史过程及其表现出来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梳理。在《儒家幽暗意识的觉醒——明末以来儒家对基督宗教罪论的回应与反思》一文中,兰州大学韩思艺认为,通过对西方民主传统中“罪恶意识”的认识,可以发掘出儒家思想传统中所包含的“幽暗意识”。在《孔子的天命观与超越形态》一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法生则认为,与基督教的外在超越、心学化的内在超越不同,孔子有着中道超越观。在《西方视域中的儒学宗教性:超越性与内在性》一文中,南京大学胡勇认为,中西文化传统中分别有着“天人合一”和“道成肉身”两种不同特质的宗教性超越,而“内在的超越”在严格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在《从宽广的历史角度看中国与西方关系的一些个人洞察》一文中,澳门圣约瑟大学田默迪认为真正能导致中国最深、最持久改变的因素是人们对于其自身价值的重新认定,而这种认定需要在基督那里找到:视每一个人为天主的子女。反过来,西方人也需要学习中国人对个人经验的重视,对于不可说的领域要保持沉默。

涉及耶儒对话个案研究的有四篇论文,分别是:陕西社会科学院丁锐中德《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试——以王徵“纳妾”与“殉明”为例的初步探析》、江西师范大学黄芸的《〈交友论〉的接受基础及与阳明学友道观念的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张涪云的《马勒伯朗士“上帝观念”及其耶儒对话的努力》、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邝禹韬的《朱熹与圣依纳爵的灵修哲学比较》。

## (三) 佛耶对话

本次会议有关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论文大多存有这样一种反思:基督教这一“普世宗教”如何能像佛教一般,在中国顺利实现“本土化”?

在《刚恒毅的“本地化”思想谱系及其对佛教的借鉴》一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国鹏认为,刚恒毅创造性地借鉴了佛教在华“本地化”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天主教的“本地化”运动。在《天主教之“补儒易佛”——张星曜个案研究》一文中,澳门利氏学社刘晶晶认为,张星曜“天教补儒”的思想是经过王朝更迭之后,儒家知识分子自省与反思的结果;而其“天教易佛”的思路是独特而有价值的。在《救苦救难:观音与福音——兼谈基督教中国化》一文中,山东大学陈坚认为,中国佛教的“观音”和中国基督教的“福音”在“救苦救难”的问题上构成了共鸣,因此上帝丝毫不差地按照中国人的特性来言说中国基督教也是可能的。在《天国与净土——保罗和亲鸾拯救论之比较研究》一文中,香港中文大学陈曦认为保罗和亲鸾两人在思想内容和思想来源上有着惊人的相似。

#### (四) 伊耶对话

关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对话与反思,在《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在全球化和合一运动时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话之探讨》一文中,西安外国语学院胡梵从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两方面对两教关系和对话之可能做了探讨。在《中国的宗教皈依:对穆斯林与基督徒皈依原因的初步比较》一文中,陕西师范大学马强认为穆斯林与基督徒皈依原因的共性在于其同城市有一定的关联。与此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景的《传教士安献令与中国伊斯兰教西道堂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王建平的《瑞典行道会传教士所观察的喀什伊斯兰教及与南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社会的关系》两文的反思则更像是一种历史的“互视”。

#### (五) 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伊斯兰教在进入中国传统文化圈的时候,同早先的佛教和晚近的基督教一样,都要面临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而且其艰辛程度从理论上讲并不比基督教少。所以在描述这一过程时,语调上的乐观多少会淡化过程的艰辛。这种艰辛既包括理论上的创新摸索,比如说陕西师范大学哈宝玉在《王岱舆伦理道德“三品”学说探析——兼及伊斯兰与儒家精神的相通性》一文中介绍了王岱舆“三品”说;也包括实践中的磨合交往,比如说宁夏大学白建灵在《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与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比较研究》一文中探讨了伊斯兰教在遇到同样是全民信仰的藏传佛教时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涉及伊斯兰教和儒家之间对话的论文,还有宁夏社会科学院马平的《伊斯兰教的“中正”与“中和”思想对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影响》和河南省委党校邹小娟的《从回族的产生和形成认识中国文化的凝聚力》两文。

#### (六) 宗教对话在中国的实践

宗教对话的研究可以表现为对历史文献的梳理、理论异同的比较和对话个案的

调查等,也可以表现为更为灵动、更为激烈的文化事件的论争。

### (1) 宗教对话在中国历史上的实践

香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梁燕城在《基督信仰融通中国的模式与当前使命》一文中,从利玛窦、李提摩太、戴德生三个传教士生命实践的角度出发,对基督教的普世话语如何在中国语境中生存和发展做出了总结和初步回答,即必须正视并耐心治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创伤。华东师范大学褚潇白在《另类的基督教:从“天兄”形象看“拜上帝教”的中国民间信仰特点》一文中认为,拜上帝教是对耶稣基督形象进行本土意识转化的结果。这种转化后的“另类基督教”因其“惩罚-救赎”的循环结构而带有太多中国民间信仰的特点。这样看来,任何外来宗教的本地化过程必然要有一个限度,一个既要保存自己又要发展自己的限度。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赵志在《基督教在华发展路径及现状反思——以2010年〈宗教蓝皮书〉公布基督教最新数据为切入点》一文中,从新数据讨论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老问题,认为立足于基督教在华发展的历史客观分析现状,是科学预测未来走势的基础。

江西师范大学蒋贤斌的《试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宗教社会观——以五四时期陈独秀、恽代英为中心的讨论》、西北师范大学尚季芳的《宗教革新与反帝爱国:建国初期甘肃省三自革新运动研究》、暨南大学陈才俊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与近代新疆的社会文化发展》、内蒙古大学刘青瑜的《20世纪20-30年代天主教传教士与绥远社会的交融》四篇论文让我们知道了,宗教作为一个多元的复杂体,可以是信仰对象、政治对象,也可以是学术对象,在不同的视角观照下,结论也会不尽相同。

在《近代河湟事变与西北基督教的传播》一文中,兰州大学刘继华认为,河湟事变推动了宣道会对西北回藏的宣教工作。在《相同的使命,不同的理念》一文中,河北进德公益事业服务中心韩清平以圣言会为例分析了罗马天主教会在传教方式上的得失、在思想理路上的变动。对这些人 and 事的回顾让我们体验到人对交流的渴望和努力,尽管他们的有些努力失败了,而我们对这些努力的回顾与研究有时也显得简单化,但是我们何尝不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努力地向前行走中呢。

### (2) 宗教对话在中国现实社会中的步伐

在《比较历史学视野下的政教关系》一文中,上海大学郭长刚和张凤梅认为,从宗教本质上说,中国社会没有出现一神化、体制化宗教的事实,恰恰表明了中国宗教的发展模式是世界宗教发展的常态。在《舟曲多元宗教的共存与对话研究》一文中,甘肃民族师范学院仇任前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舟曲藏传佛教、基督教、民间宗教之间的交流互动做了描述。在《基督教哲学与中华文化的汇通之路——辅仁学派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北京师范大学孙维认为,作为台湾新士林哲学核心阵地的辅仁学派

在沟通中华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正统士林哲学方面做出了重大努力与贡献。

在《“圣像”乎？“圣道”乎？——用“三个代表”思想来透视天安门前的“圣像”》一文中，陕西师范大学李灵指出，“三个代表”的提出意味着一个治国理念上的转变，即从“政治意识形态”建立理想国到按照“先进文化”建立民族国家。而天安门前孔子像的争论其实就是一个文化认同乃至身份认同的问题，孔子的圣像可以这样立起来，但中国人认同感和凝聚力这一“圣道”却未必就会如此轻易的挺立起来。而在《评尼山论坛与曲阜建教堂争议》一文中，香港浸会大学罗秉祥的这一话题更是引起了与会专家关于“死儒”、“活儒”等儒家现代性问题的论争，这场论争因关切当前的现实性尤显活跃，但也因时间有限而言短意长。

**English Title:**

**A Report on the Third Academic Conference on Religious Dialogue and Harmonious Society in Lanzhou University during May 10<sup>th</sup> -12<sup>th</sup>, 2011**

CHEN Shengbai

Associate Professor, Lanzhou University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for Religion and Culture at Lanzhou University, 730000 Lanzhou, Gansu Province, China

Email: chensb@lzu.edu.cn

TIAN Fei

MA candidate in Philosophy, Lanzhou University, 730000 Lanzhou, Gansu Province, China

Email: rerc@lzu.edu.cn